

译介之旅

面向那些普通而稀薄的诗意事物

——《玫瑰朝上》译后记

□李 琬

翻译这本书,使我第一次有了珍贵的机会,在精神上接近一位境遇与我截然不同、长期生活于当今世界最动荡不安的地带的同代人。翻译过程中,我不得不在Instagram上求助诗人本人,问他使人悲伤的问题:某一首诗里死去的“brother”究竟是哥哥还是弟弟。

莫萨布·阿布·托哈和我差不多年纪,准确来说还比我小一岁:他生于1992年。然而他的生命历程已经十分厚重。原本貌似遥远、抽象的巴以冲突,在阿布·托哈的诗中骤然迫近。他用诗句勾连起这些印象与记忆,和我数年前阅读爱德华·萨义德著作的记忆一起,重新激活了我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关心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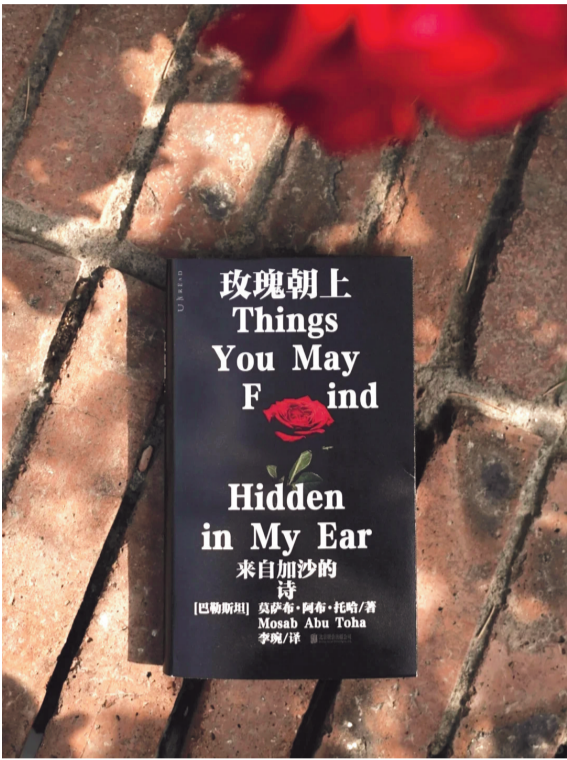
虽然诗人目前已经离开加沙在美国生活,但他的精神和意识仍然徘徊在故乡加沙,他人生前三十年都在那里度过。与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有所不同,对于出生、成长在难民营里的阿布·托哈而言,他的整个成长阶段都笼罩着对于战争和死亡的切身恐惧。一个个伤亡场景引发的惊骇和亲友丧生带来的创伤深刻塑造了他的写作。他本人曾在2008年受伤住院(他在《伤口》这首诗里记叙过),后来经历了2014年持续51天的袭击以及2021年5月、2022年8月的袭击。诗集中大多数诗作,都记录了诗人亲身经历的而非听闻的事件。

阿布·托哈不仅常常体验到国族身份不被人承认的飘摇无根之感,更因为生存空间的促狭而发出了“就连墓地也不再欢迎我们”的感叹(他在最新一次访谈中如此表示)——在他得知就连巴勒斯坦人墓地也会被摧毁的时候。他的写作——充满无人机、战斗机、直升机的喻响以及炸弹降落的恐怖喧嚣——是离我们的时代最近的、最令人窒息的见证文学的代表。

诗人去国离乡之后的这一年时间里,加沙地带新一轮动荡仍在持续。所有这些事件,都能轻易在网上读到、在电视里听到,我无须赘述。但这些频密的报道,是否也给我们带来了因为“习惯”而濒于神经麻木的危险?读阿布·托哈的诗时,无数新闻报道中层层叠叠的伤亡数字,忽然在我们眼前变回鲜活的生命、流血和痛苦,让我们记起,某些事件愈是一再发生,我们就愈是应该拒绝“习惯”。

在很长时间里,除了达尔维什,中国大陆对于当代巴勒斯坦诗歌的译介并不多。1975年国内曾出版过一本薄薄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共振于1973年10月的中东战争,风格较为单一。入选诗人和作品数量十分有限。此外还能在中文刊物和网络上读到对于法德娃·图甘、萨米赫·卡西姆等诗人作品的零星翻译。

现在,我们看到了真正同步于今天这个时代的阿布·托哈,他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达尔维什的巴勒斯坦抵抗诗歌。比较起来,达尔维什在创作生涯大部分时期得以保持一种更有疏离感的旁观视角和回忆的姿态,他笔下的抒情主体和抒情对象往往具有象征性和集体性,他的诗经常使用许多有文化原型意味、乡愁情绪的意象来书写“祖国的挽歌”;而阿布·托哈诗句的呼吸更为急促、更具有身体感,这些诗高度熔炼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技艺,善于使用个人化的语调和充满断裂、空白的手法,主要不是通过



思想和议论,而是通过极为简单的词汇和迅疾分行的短句,描绘一个个极有现场感的情境,在快速的叙事或激烈的呼告中传递强烈的气氛与情感。

在写个人的生命经验之外,阿布·托哈也多次在诗中向萨义德、乔姆斯基、格桑·卡纳法尼等学者和作家致敬。《墙与钟》这首诗也与萨米赫·卡西姆的诗《墙上的钟》发生了对话。诗人对这些作者的指涉也许显得略有些仓促、简单,却也因此展现了某种如结实绳一般将不同个体连接起来的粗粝的精神纹理,这种因为巴勒斯坦事业而缔结的精神联系,已成为这位年轻诗人在孤独中想要第一时间转向的驰援与共在:正因为无家可归和格格不入,他们才能无比紧密地形成一个共同体,无形中彰显着巴勒斯坦人民的“sumud”(坚韧不拔)品格。

除了以想象自己死后被亲友环绕的场景为结尾的长诗《伤口》,那些更为简短有力的诗,比如《剧烈运动》《在加沙的海岸》,也同样令我极为震撼。“努力活着度过/接下来一天,就意味着/从死者中间回到人世”;/“我会搜集贝壳和卵石,在沙滩上/为我们建造一座房子,等你来。/你不知道在你来之前/我已经建造过多少房子。/也许到那天,我已经重建了整个加沙。”这类句子,或许会给时时感到审美倦怠的当代诗歌读者带来情感上的猛烈一击。对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日常生活的诸多忧患固然迫切甚至沉重,但又如何能够以之真正度量和共鸣作为“被迫害者的受害者”的加沙民众之苦难?

我们在诗歌和文学中感受或想象出离日常生活的痛苦,最终是为了朝向痛苦的减少和终结,即便这是一个难

以企及的理想。正是在阿布·托哈的诗歌中,我看到,文学并不只是如许多文学理论家所定义的那样,是某种“对于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而是同样蕴含着极具现实性的疗愈、联结与呼吁功能。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布·托哈在访谈中谈到,他在读西方经典诗歌时意识到某种对于正常、宁静生活的渴求,并且也因为在自己身边发现西方诗人写到过的那些美好事物(如一只柠檬)而倍感安慰,因为他觉得,尽管置身于难民营和满目疮痍的世界,但自己“就生活在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等这些作家生活过的那个地球上”。这段表述,解释了阿布·托哈的诗让我感到格外亲近的重要原因:他没有因为战争和抵抗的主题而抛弃或贬低对于日常生活、对于恒久不变之物的钟爱;他不会通过贬低某种主题而抬高自己对于苦难的诚恳的书写。这将他与某些借助特定社会议题来贩卖自己的诗人鲜明区分开来。在今天,如果一个诗人仅仅是去写柠檬、大海、云朵这样的事物,有可能被批判为陈腐、固化,但我们也应该明白,陈腐的情调并非来自这些意象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在诗歌中观看和描绘它们的方式。阿布·托哈向我展示了一个加沙青年写作者的独特的观看方式——这些看似“普通”“正常”“自然”的诗意事物,在许多人的生命里,恰恰显得多么稀薄而奢侈。

伴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我想,对于当代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而言,莫萨布·阿布·托哈将成为达尔维什之外又一位不容忽视的巴勒斯坦诗人。

(作者系青年诗人、译者)



莫萨布·阿布·托哈

把童年留在身后

离开时,我把童年留在了抽屉和厨房餐桌。我把玩具小马留在塑料袋里。我根本没回头看一眼钟就走了。我忘了那是中午还是傍晚。

我们的马独自度过黑夜,没有水,没有晚餐粮食。它一定在想,我们只是暂时离开去给迟到的客人做饭,或者给我妹妹的十岁生日做个蛋糕。

我和妹妹一起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我们唱了生日歌。战斗机在高空回响。

疲惫的父母走在后面,父亲紧紧攥着放在胸口的我们的房屋和马厩的钥匙。

我们抵达救助站。有关空袭的新闻在广播里大声播放。

我憎恨死亡,但也憎恨生命,当我们不得不走向漫长的死亡,一边还默诵着永无止尽的颂歌。

何以为家?

何以为家:
是我上学路上的树荫,在那些树被连根拔起之前;
是我祖父母挂在墙上的黑白结婚照,在屋檐倒塌之前;
是冬夜里许多蚂蚁会睡在上面的,我叔叔的礼拜毯,
在它被夺走、被放进博物馆之前;
是我母亲曾用来烤面包和鸡肉的炉子,在炮弹把
我们家炸成灰烬之前;
是我在那儿看足球赛、在那儿休憩的咖啡馆——
我的孩子打断了我:只有四个字母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
承载这一切吗?

——选自《玫瑰朝上》,【巴勒斯坦】莫萨布·阿布·托哈著,李琬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做语言的学习者、城市的观察者

——《带一本书离开巴黎》创作谈

□李 琦



2025年5月,《带一本书离开巴黎》终于出版了。我很难简单地用“评论集”或者“随笔集”来概括它,因为在这本书里,有法语文学评论,有影视艺术介绍,有巴黎生活随笔。全书分为“文学”“艺术”“城市”三个部分,像一块七巧板、一个万花筒,彼此独立又相互影响。文学塑造了我,艺术启发了我,而这一切都是在巴黎发生的。这本书的自序《流动的盛宴,永恒的巴黎》最初发表在《文艺报》“世界文学地图”栏目,我在其中分享了很多在巴黎收获的美好时刻。

时间回到2020年11月,我被外派到巴黎工作。当时城市仍有宵禁,出门需要填写证明,于是下班后的晚上我就待在家里读书。怀揣着想要把法语新书推介给国内读者的想法,我写了一篇又一篇书评。2021年夏天,巴黎解封,电影院恢复营业,我办了一张年卡,开启了沉浸于电影院的时光。2022年我遇到了两部非常喜欢的影片:《巴黎夜旅人》和《晨光正好》,影评也投给了《文艺报》。与此同时,我看了很多展览,伊夫·圣罗兰的高级时装,苏珊娜·瓦拉东的肖像画作,观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平行世界。

收录在这本书第一、二部分的内容基本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学、影视和艺术相关文章。然而,我一直觉得比这些更有趣的,其实是我的巴黎生活,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的、体验过的巴黎生活。所以,在做完前面的整理工作后,我决定动

笔写一写,于是有了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这部分文字可能还稍显稚嫩,但绝对是我的诚意之作,我的出发点是希望尽可能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记录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见证了我在巴黎的探索与思考,也塑造了我现在的喜好与品格。

阅读平台上有一个条目叫“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写下当天发生的3件好事”,我在这里留下了600多条记录,初衷是觉得如果不写下来,就一定会忘记,久而久之竟然成了一个习惯。白天,我出门在外,睁大双眼;晚上,我回到书房,敲打键盘。黄荭老师的推荐序标题“站起来生活,坐下来写作”完美诠释了我在巴黎的日常状态。这些年,我把自已看作是语言的学习者、城市的观察者。我留心地铁站通道的广告,我观看公交车车身的海报,我阅读集市果蔬摊上的招牌,我学习展览现场画作旁的介绍。我穿梭于真实的城市街道,一边走路一边思考;我徜徉在虚拟的文学海洋,一边阅读一边思考。

我读了旅居德国的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的《和语言漫步的日记》,像她一样收集生活中和语言相关的时刻。我在书里也举了几个例子:在果蔬店购买甜菜头,第二次见到收银小哥时,他对我说了句“rebonjour!”(“你好”,但是比起“bonjour”带着某种“我记得你”的意思);在餐厅吃完饭准备去看电影,服务员小哥用“bonne s é ance”(观影愉快)和我道别;我告诉店员只要一颗冰淇淋球,她耐心纠正我“球”这个单词是阴性,应该是“une boule”。

我读了印度裔美国作家裴帕·拉希莉的《罗马日记》,在她笔下,学习外语不再是“和语言漫步”,而是“在溺水中学会游泳”。她还没有熟练掌握意大利语,就只身跑到罗马生活,她用意大利语写日记,她渴望的是“被人理解,并理解我自己”。当地写下“我能沿着这门语言的边界行走,但它的内部始终躲避着我”时,我在内心大声疾呼,我学习法语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次我在巴黎看病,我才刚开口,年轻的医生用英语温柔地说道:“我们也可以讲英语。”我说:“不,我要讲法语。”那些法语母语者根本无法想象,我有多么看

急想要掌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

法语联盟邀请了作家米格尔·博纳富瓦分享他的新书。在活动现场,我才知道作家的父亲是智利人,母亲是委内瑞拉人,曾作为外交官派到法国工作。尽管作家在巴黎出生,但是他跟随父母辗转各地,主要在委内瑞拉和葡萄牙生活,就读于当地的法国学校。成年后,他还在罗马和柏林短居。他的妻子是丹麦人,他开玩笑说如果妻子的父母来家里做客,那么餐桌上将出现好几种语言。之所以选择用法语写作,是因为在他眼中,法语是一门“艺术的语言”。在签售环节,我向他请教学习心得,他告诉我一定要多说。

我在新书里也记录了我 在巴黎学习语言的故事,有巴黎市政府给成人组织的法语夜校课,也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午安排的法语阅读课。在课堂上,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是我最感兴趣的主题之一。有次法语老师突然说了句:Voilà! 然后他问我们,在你们国家,这个词要怎么翻译呢?别看这么简单的一个法语单词,它夹杂了一种“你看啊”“就是这样”的意味在里面,这些复杂情绪要如何 在译入语中表达,我思考了很久也没有答案。

我在巴黎寻找带字幕的电影来练习听力。放映前,屏幕上总会出现一行“温馨提醒”：“本部法语影片为带字幕版本”。每次这个时候,观众席里总有几个人发出嗤之以鼻的声音。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最期待的就是带字幕的电影了。有了字幕,很多我听不懂的句子就以文字的形式直观地呈现在我眼前。那一刻我明白了,因为我在这门语言中处于“弱势”,需要得到帮助,所以我才能体会到这种人文关怀的力量。

电影院属于每个人,剧院也是。这些年我在巴黎看了近200场演出,我的法语还没有好到可以不费力气全部听懂的程度,所以很多时候都看得一知半解,但这并不妨碍我坐在剧院里感受戏剧的魅力。2024年,法兰西剧院的外墙贴了一张通知,上面写道:从3月1日起,剧院提供带字幕的眼镜。归还机器的时候,我看到演出当天的中

请名单上只有我的名字。也就是说,在法兰西剧院的后台,有一位工作人员一直实时跟进字幕,仅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我热爱的这座城市,也在以她的方式,用温柔包围着我。

巴黎的文化气息渗透到各个角落。有次我在餐厅吃饭,店员问我还要不要甜点,我说今天先算了,我一会儿要去看电影,时间有点赶。他问我看什么电影,我告诉他是《驴皮公主》。他说,哦,雅克·德米的电影。他问我是不是第一次看,我说不是,但我看过德米的其他影片,不过我更喜欢的是瓦尔德。他笑了,说这部电影非常不错,他看过好几遍,他相信我一定会喜欢。还有一次,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结束后我去前台买剧本,工作人员问我喜不喜欢这场戏,我说太喜欢了,我问他,这是新排的戏吗?他说不是的,七年前这个戏就在这家剧院演过。他又介绍了这位导演的其他作品,还提到不久后14区的剧院会有另外一场演出。

这位导演名叫蒂亚戈·罗德里格斯,是我近年来最喜欢的戏剧导演。早在2022年初,我在奥德翁剧院看过他的《樱桃园》,但当时我的关注点都在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身上。和前台小哥交谈完,我开始搜索罗德里格斯,又陆续看了《由心》《恋人合唱团》《赫库芭,不是赫库芭》。他甚至见到了导演本人,排在队伍最前面请他在我买的剧本上签名。罗德里格斯不是法国人,他在葡萄牙里斯本出生,2022年9月起担任阿维尼翁戏剧节总监,也是第一位外籍总监。《由心》是他自导自演的作品,现场很多即兴内容,非常考验语言功底。尽管他在台上调侃自己的法语,但其实他讲话流利极了。我真羡慕他,我希望自己也可以说得和他一样好。

在巴黎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因为总有新的体验和新的感悟。前不久,我在奥德翁剧院看了一场不花钱的戏,名字是《台上的弗雷斯纳》。开场前,我查了一下才知道弗雷斯纳是一座城市的名称,其中的弗雷斯纳监狱是法国三大监狱之一,主要关押轻罪犯人,而这场戏的演员就

是这所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两位专业演员每周三次前往监狱指导排练,于是有了当晚的舞台呈现。这项计划从2014年开始实施,直到今年一 共在奥德翁剧院上演了8场演出,140名服刑人员表演,5000名观众观看。谢幕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

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里,意大利人亚历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生活。我同意他的说法,异国他乡就是梦幻岛,“一个可以让时间静止的地方。远离自己的原生社会,没有人催你到点要怎么样,你因此获得了某种无年龄的身份”。但同时,“失去的是生活的节奏。二十多或四十多,你可能过得都一样”。站在梦幻岛的入口,我们各自交了门票钱,剩下怎么生活就看自己了。2013年9月,我第一次拿到了这个梦幻岛的门票,开启为期一年的本科交换学习。出发之前,我读完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后来当我真的置身巴黎,亲眼看到了凯旋门、方尖碑、巴黎圣母院,林达笔下的文字变得具象,变得有形,变得鲜活。我在想,要是有一天我也可以写一写我眼中的巴黎呢?《带一本书离开巴黎》这个书名在那时就已经悄然萌芽。

重新回到巴黎这片土地,我比学生时代更加珍惜时光。我像一块海绵,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去用力生活;我像一株植物,大口吸收着这座城市提供给我的文化养料。虽然我一刻也没有停歇对这门语言的学习,对这座城市的探索,但是四年过去了,我发现梦幻岛里的很多设施我还没有玩,又或者,即使是一个设施,玩一次和玩两次的体验也不尽相同。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将巴黎作为圆心,利用年假去参观附近的其他梦幻岛。继巴黎之后,我在《文艺报》又发表了有关都柏林、雷克雅未克等文章。等待《带一本书离开巴黎》出版的一年时间里,我写了更多的城市文学游记,里昂、华沙、奥斯陆、马拉喀什、卢布尔雅那等等。新的书稿已经整理完毕,它的书名或许可以叫做《带一本书从巴黎出发》。

(作者系法语文学译者)